

徐道彬 著

皖派学术与传承

吴山书局

徐道彬
著



皖派学术与传承

WANPAI XUESHU YU CHUANCHENG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皖派学术与传承/徐道彬著.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12.3

ISBN 978-7-5461-2723-1

I. ①皖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研究—安徽省 IV. 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7966 号

皖派学术与传承

徐道彬 著

出版人:任耕耘

责任编辑:任耕耘 韩开元

责任印制:李 磊

封面设计:钱志刚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762 3533768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:0551-5859596

开本:700×1000 1/16

印张:41.5

字数:80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978-7-5461-2723-1

定价:1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安徽大学徐道彬教授,先前专攻戴东原学术,以力作《戴震考据学研究》而深为四方学人赞许。此后又负笈金陵,北上京师,问学于宿儒与俊彦,将先前之研究加以拓展和深化,视野所至,博及乾嘉时期之江南考据学风。近者,欣悉道彬教授新著《“皖派”学术与传承》,行将由黄山书社出版。遵嘱,谨将往日读书所得忝附骥尾,既志祝贺,亦敬请道彬并四方大雅先进赐教。

清朝的乾隆初叶,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三十至六十年代,在中国学术史上,曾经出现过—个古学复兴的潮流。这个学术潮流由江南中心城市发端,沿大运河由南而北,直入京城,在取得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之后,演为清廷的文化政策。于是朝野共鸣,四方流播,最终形成盛极一时的经史考证之学,因之拔宋帜而立汉帜,遂有汉学、朴学之谓。晚近治学术史之前辈诸大家,乃径称之为乾嘉学派。探讨乾隆初叶古学复兴潮流在江南中心城市的形成过程,对于推进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,或许不无益处。

一、兴复古学之前驱

明清时期,江苏苏州以富庶的经济、便利的交通和久远而深厚的文化积累,成为包孕吴越的人文渊薮。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,即肇端于此。

当明末季,中国社会步入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。入清之初,经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,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趋于没落,客观地提出了吾国学术何去何从的问题。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准的制约,决定了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,不可能产生比宋明理学思维水准更高的学术形态。因此,一时学林中人反思宋明学术,歧路

彷徨,无所适从,既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。于是摆落宋明,回归两汉,从而导致兴复古学风气在江苏苏州的发轫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钱宾四先生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做过可信可据的追根溯源。根据钱先生所揭示之历史真相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同理学中人“性与天道”的论究异趣,在晚明的学术界,已经出现“通经学古”的古学倡导。此风由嘉靖、隆庆间苏州学者归有光开其端,至天启、崇祯间常熟钱谦益崛起,兴复古学,呼声不绝。钱谦益有云:“自唐宋以来……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,曰制科之习比于俚,道学之习比于腐。斯二者皆俗学也。”一如归有光之倡导古学,钱谦益进而明确提出“以汉人为宗主”的治学主张,他说:“学者之治经也,必以汉人为宗主……汉不足,求之于唐,唐不足,求之于宋,唐宋皆不足,然后求之近代。”

从归有光到钱谦益,晚明苏州地区学者的经学倡导和兴复“古学”的努力,表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,已经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。入清,儒林中人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进,通过重振经学而去兴复古学,遂有苏州大儒顾炎武及其训诂治经方法论的登上历史舞台。

宋明数百年,是理学的时代,理气心性的论究,在为学方法论上,赋予学术界以义理思辨的好尚。数百年间,理学中人轻视训诂声音之学,古音学若断若续,不绝如缕。积习既成,以叶韵而强古就今,乃至率臆改经而不顾。有鉴于此,顾炎武认为,治经学而不讲音韵文字,则无以入门。于是在致友人李因笃的论学书札中,力矫积弊,重倡古学,提出了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”的训诂治经方法论。同新的为学方法论的提出相一致,顾炎武倡导融理学于经学之中,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,用他的话来讲,就叫做“古之所谓理学,经学也”,“今之所谓理学,禅学也”。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,在他看来,不去钻研儒家经典,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,就叫做学不知本。因此,他呼吁“鄙俗学而求《六经》,舍春华而食秋实”,溯源两汉,澄清源流。顾炎武就此指出:“经学自有源流,自汉而六朝,而唐而宋,必一一考究,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,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。如论字者必本于《说文》,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。”

顾炎武复兴古学的努力,登高一呼,回声四起,率先在苏州激起共鸣。

吴江经师朱鹤龄与顾炎武唱为同调,认为:“经学之荒也,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,苟求其是,必自信古始。”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学者费密,亦力倡“专守古经”,主张“学者必根源圣门,专守古经,从实志道”。关中大儒李颙更遥相呼应,重申“其实道学即儒学也,非于儒学之外,别有所谓道学也”。尤可注意者,一时南北学人之主张,通过儒臣讲论已进入庙堂。据《康熙起居注》记载,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八月初八日,“讲官牛钮、陈廷敬进讲《尚书》……二臣奏,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,以为立身致用之本,而道学即在其中……上曰然”。由此可以窥知,学人重倡经学之努力,已得清廷认可。

入清以后,由于诸多方面因素构成之历史合力所作用,苏州诸儒兴复古学的努力,尤其是顾炎武提出的训诂治经方法论,潜移默化,不胫而走。至乾隆一朝,迄于嘉庆、道光间,由识字审音入手,通过古字、古言的考据训诂,进而把握典章制度大要,准确诠释儒家经典,遂成数十年间主流学派共同恪守的学术矩矱。

二、江永与徽州诸儒

探讨雍正、乾隆间的古学复兴,徽州是一个当予重点关注的地域。梳理是时一方大儒江永及受学诸弟子之学行,或可略得管中窥豹之效。

江永,字慎修,号慎斋,安徽婺源(今属江西)人。生于康熙二十年(1681),卒于乾隆二十七年(1762),享年八十有二。婺源为朱熹故里,理学名邦。江氏一门,经史传家,永父期,寄籍江宁,为县学生,自永幼年,即以《十三经注疏》课督。永禀承庭训,读《大学》,知为学入手乃在格物,博涉多通,务求心得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)起,在乡开馆授徒,时年二十七。之后,潜心《礼经》,发愿结撰专书,以成朱子晚年纂修《仪礼经传通解》未竟之志。历时十余年,康熙六十年(1721)书成。全书九十一卷,初名《存羊编》,继改《增订仪礼经传》,凡三易其稿,终定名《礼书纲目》。该书承朱子遗意,区分类聚,别定规模,作嘉礼、宾礼、凶礼、吉礼、军礼、通礼、曲礼、乐八门,计一百零六篇。全书以辑录“古注与释文”为主,旨在“但欲存古,以资考核”。由于卷帙过繁,刊行不易,故而书稿尘封十余载,“几为虫蚀鼠穿”。

乾隆元年(1736)六月,清廷开馆纂修《三礼义疏》。安徽地方当局奉命,将《礼书纲目》抄送书馆。是年冬,同郡理学名儒汪绂有书致永,询问《礼书纲目》梗概。未待江永复书,绂书再至,误信传闻,疑永为学博杂,徒“以博洽自见”。三年(1738)春,永复以长书一通,介绍《礼书纲目》大要,彰明立身及为学旨趣。书中,探讨古礼、古乐,以明“存古”、“道古”、“志古”、“好古”之意,虽高言复古,亦主张“不必泥古”。九月,绂接永书,误会释然,于答书中以“从事于经学”共勉。至于如何从事经学,汪绂不赞成“因时艺而讲经学”,亦反对“汗漫之书抄”,提倡汉代经师的专门之学,主张:“学者苟具中上之资,使能淹贯六经,旁及子史,尚矣。如其不能,则莫若专攻一经。”翌年春,永再有长书复绂,告以“早年探讨西学,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,近著《翼梅》八卷,写本归之梅氏令孙”。又称:“《近思录》,吾人最切要之书,案头不可离者。俗本离析破碎,宋时叶采之注亦未备。尝为之详注,采取朱子之言,以注朱子之书。朱子说不备,乃取叶说补之,叶说有未安,乃附己意。足之十四卷,已有成书。”

乾隆五年(1740),应在乡翰林院检讨程恂之请,永执教休宁程氏家馆。以花甲之年,完成历学书七卷,计有《金水二星发微》、《七政衍》、《冬至权度》、《恒气注历辨》、《岁实消长辨》、《历学补论》、《中西合法拟草》等七种。同年八月,随程恂入都,三礼馆总裁方苞及儒臣吴绂、梅穀成、杭世骏等,皆前来问学论难。六年(1741)八月返乡,迄于乾隆十二年(1747),除短暂讲学郡城紫阳书院及赴江西阅卷外,皆在程氏家馆。其间,休宁戴震负笈问学,成为及门高第弟子。

乾隆十四年(1749),清廷诏举经学特科,永以年届古稀而辞荐,并致书戴震,表示“驰逐名场非素心”。十五年(1750)七月,永七十大寿,震以及门高徒而撰寿序,序中称:“吾师江慎修先生,生朱子之乡,上溯汉、唐、宋以来之绝学,以六经明晦为己任。震少知向慕,既数年,始获一见,又数年,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。所读诸经,往来问难,承口讲指画,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。既而先生就馆本邑,未能从学,深怅怅焉。”又说:“震少览近儒之书,所心折者数人。刘原甫、王伯厚之于考核,胡舛明、顾景范、阎百诗之于水经地志,顾宁人之于古音,梅定九之于步算,各专精一家。先生之学力思力实

兼之，皆能一一指其得失，苴其阙漏，著述若此，古今良难。”

乾隆十八年(1753)，应歙县西溪汪氏之请，永主持汪氏家馆教席。戴震、方矩、金榜、程瑶田、汪梧凤等远近弟子云集，执经问对，同调共鸣。翌年，戴震避仇入京，行囊携永著《推步法解》、《翼梅》等新作。时值儒臣秦蕙田奉命撰《五礼通考》，遂全录《推步法解》，并将永相关论说辑入《观象授时》一类。

江永晚年，虽已届耄耋，依然课徒授业，著述不辍。迄于乾隆二十七年(1762)三月病逝，不过短短十年间，相继再成《乡党图考》、《律吕阐微》、《春秋地理考实》、《古韵标准》、《河洛精蕴》、《四声切韵表》、《音学辨微》诸书。永为学一生，贯通汉宋，实事求是，毕生究心名物制度、经史舆地、天文历算、律吕音韵，尤以三礼之学最称专精。所著除前述诸书外，尚有《周礼疑义举要》、《仪礼释官增注》、《礼记训义择言》、《群经补义》、《考订朱子世家》等。乾隆中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著录永书达十五种、百余卷之多。永学得弟子戴震、金榜、程瑶田等发扬光大，不惟开一代乡邦学术风气，而且声应气求，沟通四方，汇为古学复兴之学术潮流。

三、苏州紫阳书院

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之中，苏州紫阳书院名儒云集，独领风骚，洵称系四方观瞻之学术重镇。回顾苏州紫阳书院之创立，考察其学术好尚之演变，或可从中看到古学复兴潮流的形成，乃历史之大势所趋，有其不可逆转之内在逻辑。

在中国书院史上，清初顺治、康熙二朝，迄于雍正初的近十年间，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。入清之初，在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之后，出于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，为了防止知识界异己力量的聚集，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绝各地书院的活动。康熙中叶以后，随着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，社会秩序逐渐平稳，于是恢复和兴办书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设的日程。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，宋代书院初起，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，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。元代以后，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，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。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，在明代大为发展。嘉、隆以还，南

北峰起的书院,即多属官办性质。清初书院,亦复如此。苏州紫阳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,于康熙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
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,重视文化教育,是一个世代相沿的好传统。宋明以降,从孔、孟到周、程、张、朱的“道统”说风行,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。入清以后,在确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过程中,清廷面临究竟是尊崇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的严峻选择。圣祖亲政,尤其是三藩乱平、国家统一之后,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。康熙四十年(1701)以后,清廷以“御纂”的名义,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《朱子全书》,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、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。五十一年(1712)正月,圣祖诏告朝野:“朱子注释群经,阐发道理,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,皆明白精确,归于大中至正。经今五百余年,学者无敢疵议。朕以为孔、孟之后,有裨斯文者,朱子之功最为弘巨。”随即颁谕,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,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。由此,清廷以对朱子及其学说的尊崇,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。

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,倡导朱子学说,端正士习,振兴学术,康熙五十二年(1713)十一月,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。翌年三月,书院落成,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,据称:“学者之所以为学,与教者之所以为教,当以紫阳为宗,而俗学异学,有不得而参焉者矣。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,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,爰建紫阳书院。”这就是说,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,秉承宋明遗风,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,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。

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,雍正元年(1723),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,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,已然发生变化。据《鄂文端公年谱》记:“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,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,时集数十百人。而四方从游,公余少暇,辄与论经史,谈经济,多前贤所未发。学者无不倾心动魄,恨闻道之晚。公乃分为古今文集,俱题曰《南邦黎献》。”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,迄于雍正初,已经渐为诗文唱和、论经史、谈经济所取代。关于苏州紫阳书院风尚的这样一个转变,20世纪30年代,柳诒徵先生撰《江苏书院志初稿》有过如下精当总结:“鄂尔泰与苏之绅耆,及一时召集

之士所作之文若诗,汇刻为《南邦黎献集》。书院之由讲求心性,变为稽古考文,殆以是为津渡。”

沿着这样一条变迁路径往前走,经历雍乾间政治风云的起伏,至乾隆初叶,苏州紫阳书院遂摆脱心性之学的讲求,成为“以古学相策励”的学术重镇。

乾隆十四年(1749),青年才俊钱大昕由嘉定来苏州,入紫阳书院求学,时任院长为王峻。据事隔四十六年后钱大昕所追忆:“予年二十有二,来学紫阳书院,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。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,谓予尚可与道古,所以期望策励之者甚厚。予之从事史学,由先生进之也。”大昕自编《竹汀居士年谱》亦记:“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,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。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,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,叹赏不置。曰此天下才也。自是课试常居第一。青浦王兰泉、长洲褚鹤侣、左莪,及礼堂、习庵皆在同舍,以古学相策励。”谱主曾孙庆曾于该条注云:“先是王少司寇肄业紫阳书院,与王光禄同舍,始知公幼慧,有神童之目。及院长询以今日人才,则以公对。院长转告巡抚,巡抚喜甚,招公至院,试以《周礼》、《文献通考》两论。公下笔千言,于是惊异,院中诸名宿,莫不敛手敬之。”注中名宿云云,依谱主自记,为惠栋、沈彤等。

排比钱大昕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的上述史料,似可形成如下三点认识:

第一,至迟在乾隆十四年,苏州紫阳书院课督生徒,已然由经史起步,旨在“可与道古”,且“以古学相策励”。

第二,此时主持书院讲席及课督生徒诸名宿,既有王峻、李果、赵虹等诗词古文名家,更有一时兴复古学之倡导者惠栋、沈彤。

第三,乾嘉时期,以经史古学名噪朝野的钱大昕、王鸣盛、王昶、褚寅亮等,其为学根柢皆奠立于苏州紫阳书院。

四、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

扬州为运河枢纽,大江东去,运河纵流,明代以来,这里一直是两淮盐运使官署所在地。入清之初,虽历兵燹,疮痍满目,但自康熙中叶以后,百废俱

兴,经济复苏,又复成为人文荟萃,商旅辐辏之区。两淮盐商及扬州士绅,素有襄助学术、振兴文教之传统,康熙间著名经师阎若璩的遗著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即于乾隆初在扬州刊行。乾隆十九年(1754),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,承一方之良好风气,借助盐商马曰琯、曰璐兄弟的财力,集四方学术精英于幕府,倡导经史,兴复古学,从而使扬州成为古学复兴潮流中的又一重镇。

当时,会聚于卢见曾幕府的四方学人,主要有陈章、江昱、惠栋、沈大成、王昶、戴震等,其中,尤以惠、沈二人影响最大。据《扬州画舫录》记:“卢见曾,字抱孙,号雅雨山人,山东德州人。……公两经转运,座中皆天下士。……惠栋,字定宇,号松崖,苏州元和人。砚溪先生之孙,半农先生之子,以孝闻于乡。博通今古,与陈祖范、顾栋高同举经学。公重其品,延之为校《乾凿度》、《高氏战国策》、《郑氏易》、《郑司农集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李氏易传》、《匡谬正俗》、《封氏闻见记》、《唐摭言》、《文昌杂录》、《北梦琐言》、《感旧集》,辑《山左诗抄》诸书。”又称:“沈大成,字学子,号沃田,松江华亭人。……通经史百家之书,与惠栋友善。”

凭藉惠栋、沈大成诸幕友的努力,卢见曾在二任两淮盐运使的十年间,先后做了几桩可谓转移风气的大事。

最先做的一桩事,是补刊朱彝尊遗著《经义考》,主张“勿信今而疑古”,倡导“穷经稽古”之学。《经义考》为康熙间经学大儒朱彝尊遗著,全书凡三百卷,彝尊生前所刻仅及其半,即告赍志而歿。乾隆十九年,卢见曾再任扬州,与盐商马曰琯、曰璐兄弟相约,慨然出资补刊,历时一年,克成完书。补刊伊始,十九年夏,卢氏有序云:“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,譬如秦人谈幽、冀事,比吴、越间宜稍稍得真。必先从记传始,记传之所不及,则衷诸两汉,两汉之所未备,则取诸义疏,义疏之所不可通,然后广以宋、元、明之说。勿信今而疑古,致有兔园册子、师心自用之诮。”补刊藏事,二十年(1755)六月,朱氏后人稻孙撰文感激卢见曾及扬州盐商马氏兄弟,据称:“书之显晦,与夫行世之迟速,固有天焉。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,其得所津逮,而拜使君与懈谷先生之嘉惠者,良匪浅矣。”二十一年(1756)二月,清高宗祭告闕里,卢见曾又将《经义考》装潢二部,恭呈御览。从此,该书得以深入官禁,流播朝野,于乾隆初叶以后经学之大盛,影响甚大。

第二桩事是辑刻《雅雨堂藏书》，率先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，揭出“汉学”之大旗。《雅雨堂藏书》辑刻汉唐典籍凡十三种，主要有《李氏易传》、《郑氏周易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郑司农集》、《周易乾凿度》等。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，至二十三年（1758）竣工，虽以卢氏署名，实则选书、校勘、撰序等，处处可见苏州大儒惠栋的辛劳。于所刻《李氏易传》，卷首卢氏序梳理《易》学源流，推尊汉学，以存古义，据称：“余学《易》数十年，于唐宋元明四代之《易》，无不博综元览，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，推汉学为长。以其去古未远，家法犹存故也。”于《郑氏周易》，同样称：“此书之传，虽不及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之完具，然汉学《易》义无多，存此以备一家，好古之士，或有考于斯。”于《周易乾凿度》，还是说：“《乾凿度》先秦之书也，去圣未远，家法犹存，故郑康成汉代大儒，而为之注。……为梓而行之，以备汉学。”于《尚书大传》，依然谓：“三家章句虽亡，而今文之学，存此犹见一斑，为刊而行之。别撰《补遗》一卷，并附《康成集》于卷末，俾后之求汉学者，知所考焉。”以上凡引诸书序言，在在接武乾隆九年惠栋著《易汉学》，以及惠氏历年对郑玄《易》注的董理和郑氏经学的表彰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乃有他日汉学之风行四方。

第三桩事是刊行惠栋未竟遗著《周易述》，以存乾隆初叶古学复兴之一重要学脉。惠栋为苏州大儒，四世传经，专意汉学。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所著《易汉学》成，以表彰汉《易》而唱兴复古学之先声。又著《九经古义》，弘扬顾炎武训诂治经之倡导，明确昭告学林：“汉人通经有家法，故有五经师。训诂之学，皆师所口授，其后乃著竹帛，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，与经并行。五经出于屋壁，多古字古言，非经师不能辨。经之义存乎训，识字审音，乃知其义。是故古训不可改也，经师不可废也。”自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起，开始结撰《周易述》，后因病故世而未成完书。惠栋生前，早在入扬州卢氏幕府之初，其治经主张即已为幕主所接受，因之始有卢见曾补刊《经义考》、辑刻《雅雨堂藏书》诸学术举措。二十三年（1758）五月，惠栋病逝。八月，卢见曾即以《周易述》付梓，于卷首撰文记云：“吾友惠松崖先生说《易》，独好述汉氏。其言曰，《易》有五家，有汉《易》，有魏《易》，有晋《易》，有唐《易》，有宋《易》。惟汉《易》用师法，独得其传。……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

先生士奇，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，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，历世讲求，始得家法，亦云艰矣。先生六十后，力疾撰著，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。孰意垂成疾革，未成书而歿。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，不敢有加焉，惧续貂也。先生年仅六十有二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，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。”

五、从惠栋、戴震到钱大昕

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中，江南诸多中心城市并非彼此孤立，互不关涉，实则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其间的往还，已然使之相互沟通，联为一体。正是众多学人的执著和敬业，共同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。以下拟略述后先接武的三位大师之相关学行，以窥杰出学人在其间所付出劳作之艰辛。

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大师，一是惠栋，二是戴震，三是钱大昕。三人之中，惠栋最为年长，生于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戴震其次，为雍正元年（1723）生人，而钱大昕最少，生于雍正六年（1728）。就年辈论惠栋是长者，戴、钱皆属晚辈。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惠栋著《易汉学》名世，成为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。是时，戴、钱俱尚在孜孜寻觅治学门径。十四年，钱大昕求学紫阳书院，因之尊惠栋为“吴中老宿”，且慕名登门拜谒。事隔四十三年之后，年近古稀的钱大昕依然深情回忆：“予弱冠时，谒先生于泮环巷宅，与论《易》义，更仆不倦，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。”二十一、二年间，大昕同窗王昶与惠栋同客扬州卢氏幕府，《易汉学》手稿即由王昶抄校。此一抄本及惠著《周易述》大要，亦经王氏而传入京城。所以彼时钱大昕自京中致书王昶，一是告：“惠氏《易汉学》，鹤侣大兄现在手钞，此时尚未付还。来春当邮致吴门，决不遗失也。”一是称：“松崖征君《周易述》，摧陷廓清，独明绝学，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。”
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冬，戴震旅京南还，途经扬州。有幸在卢氏幕府同惠栋订交，当时情景，戴震记之甚明：“震自京师南还，始覲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。先生执震之手言曰：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，休宁有戴某者，相与识之也久。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。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，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，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覲，益欣幸获覲先生。”三十年冬，戴震

过苏州，晤惠栋遗属及诸高足，曾撰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一文，以缅怀亡友。文中高度评价惠学云：“先生之学，直上追汉经师授受，欲坠未坠，埋蕴积久之业，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，俾斯事逸而复兴。震自愧学无所就，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，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。”正是在这篇文章中，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，提出了“故训明则古经明”的著名主张。同时，又将这一主张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，对惠栋学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。他说：“松崖先生之为经也，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，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，由是推求理义，确有据依。彼歧故训、理义二之，是故训非以明理义，而故训胡为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，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，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。”

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《古经解诂》撰序，重申前说，系统昭示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。他的结论是：“经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其词也，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语言，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，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，而不可以躐等。”篇末，戴震重申：“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，惠君与余相善，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。二三好古之儒，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，则以志乎闻道也，或庶几也。”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清廷开《四库全书》馆，戴震以举人奉召入京修书。至此，汉学得清廷优容，大张其军，风行朝野，古学复兴蔚成风气，如日中天。正如当时著名史家章学诚所记：“于是四方才略之士，挟策来京师者，莫不斐然有天禄、石渠，勾《坟》抉《索》之思。而投卷于公卿间者，多易其诗赋、举子艺业，而为名物考订，与夫声音文字之标，盖駸駸乎移风俗矣。”

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五月，戴震在北京去世。此时钱大昕已急流勇退，归隐林泉，以博瞻通贯而主盟学坛。五十四年（1789），大昕入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回首当年求学紫阳，不觉已整整四十年过去。在迄于嘉庆九年（1804）逝世的十六年间，钱大昕弘扬紫阳书院传统，以“精研古学，实事求是”而作育一方俊彦。据钱庆曾《竹汀居士年谱续编》记：“公在紫阳最久，自己酉至甲子，凡十有六年，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，不下二千人，悉皆精研古学，实事求是。如李茂才锐之算术，夏广文文焘

之與地，鈕布衣樹玉之《說文》，費孝廉士玠之經術，張征君燕昌之金石，陳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學，几千年之絕學，萃于諸公，而一折衷于講席。”

後海先河，飲水思源，晚年的錢大昕，以一杰出史家而梳理當代學術史事，分別為惠棟、江永、戴震諸家立傳，尤為留意表彰傳主興復古學之功。江永一傳，大昕稱傳主“讀書好深思，長于比勘，于步算、鐘律、聲韻尤明”。且記云：“休寧戴震，少不譽于鄉曲，先生獨重之，引為忘年交，震之學，得諸先生為多。”戴震一傳則大段征引震撰《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》、《古經解詁沉序》諸文之主張，將傳主為學宗旨歸納為“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，由訓詁以尋義理，實事求是，不偏主一家”。在《惠先生棟傳》中，錢大昕總結數千年經學史，尤其是宋元以降學術積弊，指出：“予嘗論宋、元以來，說經之書盈屋充棟，高者蔑棄古訓，自夸心得，下者剿襲人言，以為己有，儒林之名，徒為空疏藏拙之地。獨惠氏世守古學，而先生所得尤深，擬諸漢儒，當在何邵公、服子慎之間，馬融、趙岐輩不能及也。”大昕準確地把握住惠棟《易》學與漢學復興的關係，他寫道：“惠先生棟……年五十後，專心經術，尤邃于《易》。謂宣尼作《十翼》，其微言大義，七十子之徒相傳，至漢猶有存者。自王弼興而漢學亡，幸存其略于李氏《集解》中。精研三十年，引伸觸類，始得貫通其旨。乃撰次《周易述》一編，專宗虞仲翔，參以荀、鄭諸家之義，約其旨為注，演其說為疏。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余年，至是而燦然復章矣。”

通過梳理惠棟、戴震、錢大昕三家的相關學行，我們似可依稀看到，乾隆初葉以後，“古學”二字宛若一根無形的紅線，把幾代學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。從惠棟、戴震到錢大昕，是否可以視為古學復興潮流形成至發皇的一個縮影，我想或許是可以這樣去認識的。

謹錄舊文奉政，同聲相應而已。倘蒙教言，感激不盡。

陳祖武 謹識

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于京東潘家園

（陳祖武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，原歷史所所長，博士生導師，中央文史館館員。）

前 言

清朝是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,与这一特殊时代相对应的清代学术,是对中国数千年的儒学典籍加以集中整理和总结的集大成时期。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,考据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整理和总结,无论是在思想与方法,还是在成就和影响方面,都是空前的。

清初,社会由乱而治,为了寻求持盈保泰之道,朝廷一方面以尊崇程朱理学而努力确立社会道德藩篱;另一方面则“以经学济理学之穷”而使古学复兴之风悄然而起。特别是在乾隆、嘉庆两朝,理学盛极而衰,也使得以摆脱宋明、回归两汉、兴复古学为职志的考据学风,顺应了这一学术历史发展的趋势,由涓涓细流而蔚为大国,故有“乾嘉考据学派”之目。

纵观中国学术的发展历史,既有政治经济的推动,也有内在理路的顺应;既有朝廷主流意识的引导,也有乡间地方学风的辅助运行。就本书讨论的范围和内容而言,清代考据学的生成和发展,与江南地域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其中,徽州学者的成就与影响,则占有重要的内容和地位。

明清时期,江南的徽州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,已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区域。因为自汉代以后,中原大族为躲避战乱,接连不断地从各处迁入皖南山区,使得中原儒家文化在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内得以完备地贮藏,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向外传播。所以,时至明清的徽州给予世人的印象,除了在封闭的山野中耸立的高大的马头墙和雄伟的牌坊群,以及“无徽不成镇”和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商形象以外,还有勤苦笃实的徽州学者,在本土“东南邹鲁”刻苦钻研,发掘传统;随徽商行营于外,传播学术,引领时代学风。今有学者发现:“在对徽州作区域体系分析中,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,明清时期的徽州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,取得了高度的整体性协调发展,

是明清时期中国境内各区域总体全面发展的典型代表,我们还未曾发现有一处可与之相比拟的区域。”^①单就徽州学术思想而言,从朱熹到戴震,从新安理学到“皖派”朴学,徽州向世人展示了辉煌的思想文化轨迹,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地域环境下的衍变,并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。而康、乾时期的徽州学人江永、戴震、程瑶田等,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的求实精神,治学注重文字声训和典章制度的考证,由训诂以求义理,信而有征,实事求是,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学风。对于这一现象,当时的段玉裁和焦循已经有所总结和阐发,他们称:“新安,为经学渊藪。”^②“徽州之学,自江文学永倡其先,戴庶常震、金殿撰榜、程孝廉方正瑶田,踵而兴焉。”^③又云:“本朝经学兴盛,在前如顾亭林、万充宗、胡朏明、阎潜邱。近世以来,在吴有惠氏之学,在徽有江氏之学、戴氏之学。”^④此后的学术界承绪而扬波,于是有了“徽州朴学”、“皖派经学”或“皖派”学术之名。

自章太炎在《馗书·清儒》中对乾嘉诸儒及其学风,按地域分析为“吴”和“皖南”以后^⑤,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又界定之为“吴派”和“皖派”,且增有“扬州学派”之名。其后学者忽略了其间的时间差,又将自身所处的政治派别观念引入学术,夸大其间的差异,以为三者各有特色,互为对立,故而衍为派系问题的讨论。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对于这些说法见仁见智,有是有非,至今未息。即使如梁启超也曾不无矛盾地说过:“清儒最

① 叶显恩《站在时代的制高点,共推徽学研究》,《徽学》2000年卷,4页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1。

② 《为吴小岩作说文引经异字序》,《经韵楼文集》,37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。

③ 《石埭儒学教谕汪君孝婴别传》,《雕菰集》卷21,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④ 《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》,《雕菰集》卷13,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⑤ 乾嘉时的黄承吉也有诗云:“太原德清濬导始,后逮吴歙双埏渊。支流派衍遂分出,师承不异昭宣年。”派与脉为同源字,吴与歙的“支流派衍”乃如水流分脉。所以说,若为研究的方便而设“支流派衍”则可;若将“派”理解为对立的派别之义,则有悖于古人之意。事实上,无论吴派或是皖派,只是一种学术现象,焦循早已对此有所注意,其说疑为章氏所本。现代学者论及此问题时,或将吴、皖之分归始于章太炎,似可商榷。本书余论部分有相关论述,可参见。